

红楼心史之二

红楼易学摭谈

王宪明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红楼心史》序

在我之无未识的童稚时代，第一次偷偷翻看《红楼梦》，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发现几幅插图。可翻遍全书，除了第八回的通灵宝玉和宝钗金锁的图样，一无所获。对于这两样东西，也还不知是什么物事，上面曲里拐弯的篆字，一个也不认识。不过通灵宝玉和络络金锁的模样，却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并在以后随着翻阅小说次数的增多印象越来越深，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通灵宝玉象征着什么？它何以有如此不凡来历与能起人生死的神通？上面的铭文与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是什么关系？这些铭文的含义是什么？

有时旧的疑问没解决，又产生新的疑问；大的疑问没解决，又产生很多小的疑问：“莫失莫忘”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莫失莫忘？如果遗忘又会怎样？怎样理解“仙寿恒昌”？什么是“邪祟”？怎样“去邪祟”？什么是“冤疾”？如何“疗冤疾”？如何理解“祸福”？判断是否“邪祟”的标准是什么？作者予夺褒贬的立场在哪里？是反孔孟还是皈依孔孟？是推崇《四书》（包括朱注）还是厌恶《四书》？是反程朱的还是修正程朱？是反礼教的还是弘扬礼教？是女性主义还是“以儿女律士大夫”？作者是汉族本位还是“首崇满洲”？是“耻情正觉”还是“爱情自由”？小说中哪些人物身上有“邪祟”？哪些情节描述了“邪祟”？

.....

多年来这些问题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其间也博览过一些红学研究著作，但不足以释我大疑。由此想来，一个人迷信权威和教科书，未尝不是坏事，至少可省却许多烦恼。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一直到了两个世纪之交，我已近不惑之

年,《红楼梦》小说都被我翻烂几套了,学识与阅历也稍稍丰富,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体系,也逐渐暗然日彰。五年前,我应邀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组编的“青少年智育丛书”撰写《观察与记忆》分册,在论述记忆的意义时,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唤醒记忆、谴责遗忘的伟大小说。群钗中第一个出场、并为全书人物命运缩影的甄英莲,能在几天之内学会做诗,并写出“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咏月佳句的青春少女,怎么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自己所经历的患难和凌辱?这其实是隐喻在清政府对汉族人民空前的洗脑运动和恐怖的文字狱压迫之下,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后对汉族人民烧杀掳掠,白骨如山的“真事”,已成为记忆的禁忌。“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天心笃佑,德教弘敷”(均见《大义觉迷录》),这类令人恶心的无耻“假语”,竟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知识界推广。而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承受历史记忆的重负,又为统治者的淫威所桎梏,认同了“首崇满洲”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不知疲倦地为他们歌功颂德。曹雪芹于是满怀沉痛,作《红楼梦》一书,若讖若纬,诡词明义,以梦幻寓现实,以家寓国,以儿女律士大夫,揭清廷之腥秽,倡中华之光复。通灵宝玉上“莫失莫忘”四字,是最无畏的抗议,最严峻的告诫,最沉痛的叮咛,是全书灵魂所在。

通灵宝玉背面的几行字:“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正是记忆——历史的妙用。历史记录罪恶,抨击暴行,揭露谎言,谴责遗忘,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此所谓“去邪祟”;表彰良善,安慰无辜,“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忠魂冤鬼,各有其归,此所谓“疗冤疾”;“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彰往所以察来,记住黑暗所以远离黑暗,掌握历

史规律与其趋势，革故鼎新，变法改制，兴利除害，斡旋气运，为万世开太平，此所谓“知祸福”。

《红楼梦》第八回咏通灵宝玉一诗，仅有八句，而有两句诗谴责遗忘：“失去幽灵真境界”，“白骨如山忘姓氏”。遗忘，在有的时候是一种罪，一种不容饶恕的罪。要补天地缺陷，首先要修补被践踏、歪曲了的记忆。

一个民族灾难深重，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财富。但一个民族若遗弃记忆，出卖记忆，那就是背叛人类的良知，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民族就永远不会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永远沉沦黑暗，于是也便无真可言，乏善可陈，更不会有美和尊严。^①

限于当时认识水平，这段文字解释通灵宝玉上的铭文含义，还有些粗糙，有些话也过于狭隘。但毕竟已经描绘出我的所谓红学体系。强调“记忆”二字，其实也就指出了通灵宝玉是记忆的寓所——“心”的象征。这个“心”字，对于理解《红楼梦》，有万钧之重。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心的文化”；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正是一部“正心”之书！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曾反复提醒读者玉石“演人心”，但由于他没作系统严密的论述，而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些话不敢明说，他的观点很少受到重视。恐怕和他说《石头记》“演《易》理”一样，被当作“无中生有的热昏的胡话”^②。

对于我，领悟到这一层，已是饱经艰辛；而要将《红楼梦》中博大精深、包罗万有的“心的文化”表述出来，更为困难。正如望尽天涯路和走遍天涯路一样劳逸不均。

① 王宪明《观察与记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6页。

②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第五章第二节，见《太平闲人张新之的评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四本小册子，收入了我十几年来探讨、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也记录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些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更多的文章，在网上以“通灵唯心”的网名或签名贴出过（我之所以选用这个网名，主要是强调《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是心的象征）。与国内外一些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也作过有益的交流。其中红学会理事乔福锦先生赐教最多。乔先生有很深的经学、史学造诣，虽然切入角度和方法与我不同，但都认为《红楼梦》有“宗经法圣”的倾向，与郑所南《心史》气息相通，并且都对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有相当的尊重。美国波莫纳学院白亚仁（Allan H Barr）博士将他本人和美国同仁的一些我感兴趣的红学研究成果惠寄，也令我受益匪浅。中国档案出版社近年推出一批很有价值的红学著作，能接受一个无名之辈的选题，令我倍感荣幸，我的同事李红梅博士，帮我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我的朋友闻溪、尹海珠、崔永胜帮我校阅书稿，改正了不少笔误……值此书出版之际，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书写作时间较长，不同阶段认识水平有参差；即使现在，仍有望道未见、见而难达之感。还由于在本书最后写作和整理出版之际，适逢所在院校迎接教育部评估，工作量较常年增加数倍，这套小书还有很多地方难以尽如人意。希望读者特别是红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著者

2007年4月10日

目 录

引言：心·易·史·《红楼梦》	1
为太平闲人一辩	16
雪芹易学家传	19
言有伦序	25
“大旨言情”	31
真事隐去	37
宝琴立法	43
阴阳顺逆	60
中秋节目	63
宝鉴正反	68
麒麟祥异	79
祸福观念	82
中庸与乡愿	91
龄官画蔷	103
小小王家	110
成窑盖钟	113
“母蝗虫”	116
硕果不食	119
贾政存周	123
日月为明	128
通乎昼夜	132
巧姐磨难	135
凤姐善恶	139

“梅鹿皮一方”	146
婉嫔四娘	153
正邪两赋	157
“天然”与“人力”	164
“大观”释义	169
大观园图	172
正朔研究	174
黛玉伤春	186
方位研究	191
服色研究	200
那山那狗	211
悲喜交集	215

引言：心·易·史·红楼梦

据《红楼梦》第一回，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本来是刻在女娲补天、炼而未用的顽石上一段石头自述幻形入世的故事，后来这块石头变成通灵宝玉，由贾宝玉诞生时带出娘胎。但上面只有二十四个字：“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

通灵宝玉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命根子”，也是我们进入这座千古迷宫的锁钥指南，通灵宝玉上的那二十四个字，实为全书之提纲挈领。晚清以易理解《红楼梦》的太平闲人在其《妙复轩评石头记》中，反复提醒读者，通灵宝玉“演人心”。这个“心”字，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都有万钧之重。

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心的文化”。心性之学，是道教哲学和禅宗学说的基础，也是宋以后儒学的核心内容。封建社会后期三教日趋调和，也正是以心性之学为桥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互为取给。当然三教也有“共享”的文化资源，儒教以《易》为诸经之首，而贾宝玉常读的《周易参同契》，既为道教“丹经之祖”，也被禅宗用来作为阐述佛法的重要工具。太平闲人以为《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乃作者“借径二氏，以演儒学”^①，其说自有渊源。

蒙王府本《石头记》十二回回末总评曰：“儒家正心，道者炼心，释辈戒心。可见此心无有不到，无不能入者，独畏其入于

^① 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第一回。

邪而不反，故用正炼戒以缚之。请看贾瑞一起念，及至于死，专诚不二，虽经两次警教，毫无反悔，可谓痴子，可谓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独欲思，岂逃倾颓？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理，以助解者生笑，以为痴者设以棒喝耳！”如此则《红楼梦》之“借径二氏”，也可以解释为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借道、释之“炼心”、“戒心”，辅助儒家之“正心”，以宗教之超越精神，提升儒家之人文世俗精神，“补王化所未及”，此亦《周易》之“神道设教”的功用。

二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史湘云与婢女翠缕论阴阳，说：“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童蒙的翠缕在史湘云的开导下，也明白了“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所谓“从古至今，开天辟地”，实际上是说历史。

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语，最为人乐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而史学与易学关系最密切。“六经皆史”而《易》为其首。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是《易》的开始，也是历史纪录的开始。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虽然学术界关于“史”字本义的解释为轩为轻，但这种说法还是较为通达的，也能说明“史”与“易”的关系。

古代统治者每遇重要事情，如祭祀、战争、婚姻、狩猎、生病甚至做梦，都要占卜、咨询，卜中则行之。《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从现在发现的商代十五万片甲骨来看，当时几乎每日必卜，甚至一日数卜。占卜运用易理，夏为《连山》，殷为《归藏》，周则《周易》，此皆卜筮之书，亦是遵照一定宗旨整理的卜筮之史。而每次占卜之后，占卜的内容及有关吉凶休咎

和卜后的应验（卜辞），被记载下来并刻在甲骨简契上，作为档案保存起来，可以视为历史记载的一种原生形态。安阳小屯村甲骨，其实就是商代的档案馆和图书馆。

在先秦时代，巫、祝、瞽、史常常并称，他们的工作性质大致相同。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瞽的传史功能日益减退；随着人类认识到天道远而人道迩，神道巫术也日渐淡出统治决策（当然，直到今天仍未完全退出）。而后世太史之职，除“记言”、“记行”，“书法不隐”外，仍兼有巫、祝、瞽的特点。《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与两个女先儿（瞎子、瞽）说史“掰谎”，褒贬扬抑，仍有其余绪。

史官周旋天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总结损益否泰盛衰消长之规律，穷神知变，对现在的洞察，对未来的预见，较一般人要深刻准确（当然这种深刻和准确往往被有意神秘主义化了）；所提出的决策、建议，也都能协和中庸，令人“寡过”，具有可操作性。周谷城先生曾说：“史官主贞卜，保图籍，备咨询，在部落首长前，实为一最亲密的而重要之人。”^①但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还有统治者对史官矫言祸福的防范，史官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甚至等之倡优。《红楼梦》中的“文官”等十二戏子，有影射明史馆博学鸿词的地方。而历史本身，常常假语存而真事隐，成了任统治者打扮的小姑娘，难得“中正”了。中国的历史，虽然不是每页都写着“吃人”，但却充满强者为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因果循环，道德和正义的呼声非常微弱，后世入纵然掌上千秋史，却往往正照宝鉴，所学者非治平天下的正道，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权术。易学作为工具，也沦落为阴谋术数，甚至江湖上的狗皮膏药。

明白了易和史的这种渊源关系，我们就对古人以史证易（如

①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页。

李光、杨万里、章炳麟），以易解史（如黄道周、王夫之），即易求史（如章学诚、刘师培、顾颉刚），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明末黄道周《易象正》、《三易洞玑》以天象历数阐讲《易》理，艰深奥衍，即使《易》学界也很少有人涉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黄道周传》记载他于崇祯五年上疏云：

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黄道周之言，在有些人看来未免夸口，却自有根据。近代易学大师杭辛斋《读易杂识·历数卦气》中一段文字，可与此发明：“吾国历数之精，不但合日月行度之数，并合天地阴阳之气，而人物之生于天地之间者，其荣枯得失，亦莫不与此气与数相合。”《红楼梦》人物命名（特别是四春），季节风物，炎凉荣辱的描写，亦通于此理。如果现代红学大师俞平伯先生也了解这些渊源，他可能就不会主张“严禁阴历”了^①。

三

《红楼梦》的通灵宝玉，最初是女娲补天未用之五彩石，而小说第一回介绍全书成始成终的甄士隐出场，说“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云云。小说第十二回说“风月宝鉴”（其实就是说本书）“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这令人联想起北宋“以《易》为宗”，“学贵心悟”的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

^① 俞平伯《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人生不过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版。

^② 《张载集·近思录拾遗》。

为何要为天地立心呢？是因为天地“无心”，是因为天地有缺陷（即《中庸》所谓“憾”）。张载《横渠易说》卷三解《系辞上》之“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一句，首引《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教父海德格尔最感兴趣的）。天地化育养成万物，无论东西方，人们都对天地怀有崇敬、感恩的态度。但大自然也充满着毁灭、破坏，充满着偶然性。无论是化育养成，还是毁灭破坏，在天地都是无心为之。所谓为天地立心，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服务之意。人是天地的产物，“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①。而人类历史与自然史密不可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天道远而人道迩”的中国古人来说，所谓历史主要是人类历史。《红楼梦》“补天”，其实是为中华民族斡旋气运。

宋张浚《紫岩易传》卷七：“天地自然之道所以运转今古，育成万物者，备于易，发于圣人之心。圣人心法之妙，与天地通一之，所该万无不举，故天地造化之几，赖以财成而成位乎上下。圣人有补于天地至大，其道神矣。呜呼，易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圣人先得之以著见于易，然则易者圣人之心也。天地之心即易之心，易之心即圣人之心，曰准曰相似犹为强名辞耳，以心观之，吾又安知孰为天地，孰为易，孰为圣人也哉！学者当反求诸心，以极夫虚静之道。心光所烛，理自不昧。用之于身，用之天下，固无所往而不宜也，可不勉邪？”

张载又有“人本无心，因物为心”^②之说，很多研究者以为这反映了作者客观事物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倾向，其实过于牵强。如果把这两句话换成“人心本空，因物而有”或不谬于张子。把人心比为一个电脑硬盘，当信息未输入时，与此硬盘皆归空寂，

① 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下》。

② 《张子全书》卷十二《语录》。

当信息输入之后，信息被编码储存，可以随时加工利用，此信息便不在硬盘之外。张载同时又说：“以闻见为心，则不足以尽心。”人的大脑不仅被动地、机械地接受信息，还能对信息进行甄别、分析，总结出各种规律，引申出各种价值。《红楼梦》第一回写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由色悟空”其实可与《易》之“得意忘象”相发明。

人类所有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都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人要参与生活、改造社会，必先认识社会。所以《大学》八事，始于格物致知。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也是强调记忆的重要。当然，儒家的格物致知，既重视客观的“真”，更重视主观的“善”，所谓“义”、“理”、“道”，都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只是一般人由于根性迟钝、意志薄弱或欲望蒙蔽，难以执著于这些价值。《老子》的“天地不仁”与伪《古文尚书》“人心唯危”相发明（《红楼梦》中说贾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正是唯危）。天地有缺陷，需要圣人为之立心；人心有缺陷，须圣人为之立命（或立道）。这都会影响社会，影响历史，所以能为“万世开太平”。《红楼梦》通灵宝玉反面“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正是这个意思。

通灵宝玉上“仙寿恒昌”这句话，令我联想起《老子》“死而不亡者曰寿”，宋遗民郑所南《心史·久久书》“身可杀，心不可杀；形可泯，理不可泯”，还有《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宗祠衍圣公书、太平闲人以为表示作者“自信其书必传永久”的一幅楹联——“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一个人如果能上下其察，具备万物，陶融古今，坚持真理，捍卫正义，遏制邪恶，拨乱反正，参赞化育，斡旋气运，造福生民，他的生命就会超越个人、家庭、阶级乃至民族局限，走进永

恒的行列。

四

无论哪一派红学家，都不否定《红楼梦》对《春秋》的师法继承。只是曹雪芹所师法的不仅有属辞褒贬的细节，还有孔子补天济民，为万世开太平的深心大义。

当然，春秋和清代时势有异，仁人志士的使命也便不同。《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红楼梦》因“夷狄猾夏”而作；《春秋》重在强干弱枝，而《红楼梦》重在尊华攘夷——当然，两者都有历史进化观，都以《中庸》为归依，都指向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大同世界。这也是《周易》“与时偕行”，“一致百虑”的表现。

《春秋》为诸史之宗，同时又是“赞《易》”的孔子所修，所以更能与《易》理相发明，都是通变寡过之书，都是“为君子谋”之书。

古人常以“天崩地陷”或“天崩地解”喻帝王去世或改朝换代。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二《留别海昌同学序》中的“天崩地解，茫然无与吾事”，即感慨王学末流空谈性命，不能拯救明朝灭亡。《红楼梦》第一回莫名其妙的“地陷东南”，其实亦寓明朝灭亡。至于“补天”云云，则是恢复中华正统，为后世开太平。俞平伯先生在1986年所作《旧时月色》一文中评《好了歌》，指出：“展眼兴亡，一明一灭，正在明、清交替之间，文意甚明。”^①这已和蔡元培等索隐派，距离很近了。

作《易》、《春秋》、《红楼梦》者，皆有忧患，皆写忧患，皆欲去忧患而致太平。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礼，乃书于策，使正其心术，

^①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第1139页。

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正由于人们“败常反礼”，社会失范（如明末自上而下的道德灾变），才造成了社会的危机和动乱，生民涂炭。

“常事不书”，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桓公四年春。《红楼梦》借事明义，亦与公羊《春秋》相通，皆本《周易》立象尽意之法，不必遵守传信传疑、直书无隐的史官准则。《周易》中龙潜狐济、格帝享王，与《红楼梦》中衔玉诞生，太虚观测等怪诞诡奇的超自然意象、情节，皆不劳史太君“掰谎”。《红楼梦》中成始成终的两个人物甄士隐与贾雨村，既影射满清史狱，同时也有《周易》、《春秋》立象尽意和借事明义的心法真传。《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胡适、周汝昌等“自叙传”派红学家，宝玉必雪芹，贾府必曹府，执相而求，胶柱鼓瑟，变昂扬千里驹为局促果下驴，难免为古人所笑。

史湘云与翠缕论阴阳易道未毕，就在蔷薇花下拾到贾宝玉丢失的“赤金点翠”、“文采辉煌”的金麒麟。麒麟乃史外传心的《春秋》的象征，蔷薇又名“四季花”、“月月红”，亦隐“春秋”二字，同时隐炎德汉统。甚至翠缕之名，亦寓虽夷狄猾夏，沧海横流，邪说横行，而人心不死，斯文在兹，正统在兹，不绝如缕。

近代朝鲜学者郑乔先生著《南明纲目》，其自序云：“《大易》扶阳而抑阴，《春秋》尊华而攘夷。以为阴胜阳刚则天道衰，夷乱华夏则人道灭矣。呜呼！环顾今日之宇宙，可谓十月之纯阴，而爱新觉罗氏以女真之遗种，窃据支那之全幅，冠履倒置，腥秽弥漫，殆三百年所，而上九之硕果，则我东土礼乐文物惟在焉！……要之闽浙之朝迁暮徙，九月之阳也；滇黔以后，则十月之阳也。支那七日之复，抑亦有其日矣。”

我读此文，有点像《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众人听了薛宝琴念一个大长今式真真国女儿“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诗：

“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五

明王朝灭亡以后，知识界追究乱亡之由，有归之学术者。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拨乱反正，亦以“明学术，正人心”为第一要务。宋明理学于是成了众矢之的。程朱与陆王，虽门径有异，但在顾炎武眼里，都接近“禅学”：

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①

《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十九回借袭人之口述宝玉说“‘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所谓“杜撰”、所谓“混编纂”，可能就是指顾炎武所说的“语录”之类的东西。《明史·儒林传》序既言“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自然杜撰的、臆说的、“六经注我”的著作，也就“太多”了。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在荣国府实行经济改革，兴利除弊的探春，批评朱子《不自弃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也被红学家们视为反理学的重要证据，但相对于清儒对程朱陆王的批评，这不过是毛毛雨。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

^① 《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

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颜元是清儒中对宋明心性之学批评最严厉的，他指责朱熹“自欺欺世”，“把人引上歧途”，甚至说朱子是金元之功臣，其学为“杀人”之学：“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①他嘲笑宋代以后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为极上品矣！”^②“习于纸墨浮文，……世道人心全坏于此”^③。看来要端正世道人心，继孔孟之绝学，首先要批判程朱陆王。

清儒批判空谈性理，重考证，倡实践，但并不等于不谈心性。毋宁说他们换了角度谈心性——清儒把心思更多的用在了史学方面，而历史不过是“心”的记忆。

顾炎武说：“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④而其正人心，致太平的主要功夫，则是“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都涉及史学。

① 颜元《朱子语类评》。

② 颜元《存学编》卷一。

③ 颜元《四书正误》卷三。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